

中国古典韵文精选文库



唐
詩

PDG

唐诗精选

张亚新 选释

(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唐诗精选

张亚新 选释

(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唐诗精选

张亚新 选释

(三)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6 号

书 名:唐诗精选

选 释:张亚新

出 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冶金印刷总厂

开 本:787×1092 1/36

印 张:29

字 数:50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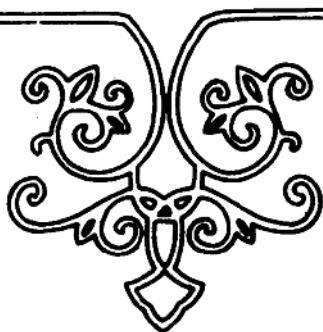
版 次:1995年9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1995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9000册

书 号:ISBN 7-5078-1285-5

定 价:40.00元



中国
古典文
韵精选
文库

主编 刘祜
颜长珂
黄克
元曲精选 赵伯陶
宋词精选 张亚新
唐诗精选 黄克

李 諧 仙 像



总 序

在浩瀚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名篇佳作是其中闪光的实体，犹如一颗颗明珠联缀起来的彩链一样，没有名篇佳作的存在，不管文学的历史多么悠久，也将黯然失色。名篇佳作是历代作者心血的结晶，是时代脉搏的回响，也是艺术成熟的标志。难怪恩格斯要说，他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专门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因之，我们要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增强爱国意识、提高文化修养，也应从学习历代名篇佳作入手。

就以我国韵文发展而言，最辉煌的莫过于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它们以其独特的成就，分别达到了各自时代的高峰，至今仍是我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之瑰宝。倘能从中筛选名篇佳作供初学者参考，以收“尝鼎一脔，窥豹一斑”之效，自是入门之捷径。为此，我们受国广出版社之重托，编纂此《中国古典韵文精选文库》丛书，并先期选注《唐诗精选》、《宋词精选》、《元曲精选》三种。

或云：此类选本，市场已多见，何必重复为之，授人以做

无用之功、图蜗角之利之讥柄？请以明之。所谓选本，无外选目、注释、赏析三部分。纵观目前出版物，在选目的宽窄上、在注释的繁简上、在赏析的详略上，皆各有侧重，亦有有注释无赏析、以赏析代注释者。之所以如此，非才力之高低，实所着意之读者对象不同使然。本精选丛书既以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为对象，志在普及，故拟在“精”字上突出自己的特点。

一是选目要适量。每种选目在五、六百首之间。名篇佳作皆注意其代表性，顾及各种风格流派，防止以偏概全；亦兼顾多种体裁样式，如诗兼顾绝、律和古诗，词兼顾小令和慢词，曲兼顾小令、带过曲和散套。

一是注释要适当。通俗明畅，信达而已。不做无助理解本义的词源的考证，也不回避难字、难词、难点的解释，从中体现工力之所在。注释而不能达意者则做必要的串讲，务求简明扼要。

一是赏析要适度。附于篇末，意在导读。古今评议、轶闻逸事，举凡有助于理解作品者均可写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名篇的赏析，因人而异，少不了主观色彩，因而也不能定于一尊。故而略陈一己之见，点到为止，也就足够了。有话则长，千八百字不为多；无话则短，一二百字不为少，总要言之有物，不做八股，别出心裁，不拘一格。

概言之，即选目精当不过偏，注释精确不过繁，赏析精审不过专。

我辈同仁，虽于古典文学学习有年，也未必全能做到以上数端，但这是我们的初衷，是给自己立下的高标准。古人

云：“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是以不敢取下误人也。

是为序。

黄 克

1995年6月

士 拾 贊 像



前 言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是中国文学的主流，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中华民族是一个最富于诗的感觉、诗的气息、诗的修养、诗的生活和诗的传统民族。诗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见证、生活的闪光、智慧的化身、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结晶。

在中国诗歌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唐诗是一个最为辉煌的阶段，一座最为恢弘瑰奇的艺术宫殿，代表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

唐诗的辉煌，首先表现在诗人辈出，诗作众多，犹如广袤夜空上满布的繁星。清代康熙年间所编纂的《全唐诗》，收录有姓名可考的诗人二千二百余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经后人辑佚，现存唐诗已达五万余首。这个数字本已可观，但就有关著录来看，实际数量还远不只这些。诗歌作者广布社会各阶层，上至帝王后妃、宰相公卿，下至樵夫舟子、工匠隶役、道士僧尼、僮仆婢妾、歌伎舞女、引车卖浆者流，甚至日本、高丽、波斯等外邦人士，无所不有。其主要成员为出身庶族地主的知识分子，他们发扬蹈厉，推波助澜，促成了唐诗的繁荣局面。他们中涌现出了王绩、王勃、卢照邻、骆宾

王、杨炯、陈子昂、张若虚、张九龄、孟浩然、王之涣、贺知章、李颀、崔颢、王昌龄、储光羲、王维、李白、高适、常建、岑参、杜甫、元结、刘长卿、张继、韦应物、戴叔伦、卢纶、顾况、孟郊、李贺、柳宗元、韩愈、李益、张籍、王建、元稹、刘禹锡、贾岛、李绅、白居易、杜牧、许浑、姚合、温庭筠、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韦庄、韩偓等一大批优秀诗人，其中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还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巨匠，犹如耸峙在群山之上的高峰，令人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叹。

唐诗对于唐代丰富多采、复杂多样的社会面貌、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社会习俗以及众多的山川风物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反映，举凡政治时事、戍守征战、边塞风情、山水田园、升迁贬谪、羁旅行役、登临游览、友谊赠答、离别相思、闺情宫怨、咏史怀古、咏怀咏物、说理游仙、题画听乐、唱酬应制无不毕备，诗歌题材的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开拓。诗歌体制空前完备，不论古诗（四言、骚体、五言、六言、七言、杂言、乐府、歌行）、律诗（五言、七言、长律、绝句）都得各尽其长、各显其妙，尤以五律、七律和七绝最为盛行，其中五律更处于领先的地位，成为唐诗中运用最多的一种诗体。诗人们或各体皆工，或偏擅一格，各显神通，尽态极妍。

唐诗风格多样，气象万千，异彩纷呈。明代胡应麟在谈到“唐诗之盛”时说：“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诗薮》外编卷三）其实，这远远不能概括唐诗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司空图《诗

品》将诗歌风格分成雄浑、冲淡、纤秣、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二十四类，即使以此来说明唐诗风格，也只能是大致涵盖，仍未能包罗穷尽。唐代有成就的诗人无不具有自己独特的风貌，王勃之婉丽宏放，陈子昂之高峻激昂，岑参之雄劲奇丽，王昌龄之雄浑自然，孟浩然之清新高远，王维之明丽淡逸，李白之雄奇奔放，杜甫之沉郁顿挫，孟郊之凄寒苦僻，韩愈之峻伟奇崛，柳宗元之幽峭明净，刘禹锡之稳练爽朗，白居易之通俗流畅，贾岛之清奇瘦峭，李贺之恢奇诡谲，杜牧之俊爽豪健，李商隐之瑰丽深微，皆独树一帜，独标其格，决不与他人雷同。加之每一位诗人又都往往具有好几副笔墨，虽以一种风格为主，但又决不仅仅株守一格，这就形成了千汇万状、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的局面。

或由于题材风格比较接近，或由于爱好志趣比较相同，或由于造诣建树大体类似，唐诗形成了众多的流派，有了上官体、元和体、长庆体、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派等种种称谓，众多诗人被并称，如“初唐四杰”（又称“王杨卢骆”）、“文章四友”（杜审言、崔融、李峤、苏味道）、“吴中四友”（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沈宋”（沈佺期、宋之问）、“王孟”（王维、孟浩然）、“李杜”（李白、杜甫）、“高岑”（高适、岑参）、“大历十才子”（具体组成说法不一，《新唐书·卢纶传》载为钱起、卢纶、吉中孚、夏侯审、李端、苗发、司空曙、韩翃、耿沛、崔峒十人）、“钱刘”（钱起、刘长卿）、“钱郎”（钱起、郎士元）、“王韦”（王维、韦应物）、“韦柳”（韦应物、柳宗元）、“郊

岛”(孟郊、贾岛)、“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韩柳”(韩愈、柳宗元)、“张王”(张籍、王建)、“元白”(元稹、白居易)、“刘白”(刘禹锡、白居易)、“李杜”(李商隐、杜牧)、“姚贾”(姚合、贾岛)、“温李”(温庭筠、李商隐)、“皮陆”(皮日休、陆龟蒙)、“曹刘”(曹邕、刘驾)、“三罗”(罗邕、罗隐、罗虬)等等。如此众多的流派,在封建社会中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使唐代诗坛形成了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星光辉映、美不胜收的局面。

唐诗繁荣局面的形成,与当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和文化高涨的局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朝是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总的说来较具活力。唐朝彻底结束了东晋以来两百多年的分裂和战乱不断的局面,并吸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自觉调整了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使之比较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安史之乱前的一百多年,经济一直处于上升的态势,为包括诗歌在内的唐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并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封建国家。国力的增强,使唐朝具有了充分的自信,在对外和对内的关系上表现出了泱泱大国的雍容大度。在对外关系上,唐朝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不仅汉民族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实现了空前频繁和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国内各民族的文化得以密切融合,而且还与日本、高丽、波斯等周边国家进行了空前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既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化艺术的发展。音乐、绘画、舞蹈、书法、雕塑等艺术门类的蓬勃发展,丰富

了诗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素材,反过来也对诗歌的发展和繁荣起了推动作用。唐代的听乐诗、咏舞诗、题画诗等之所以特别多,不少诗人之所以能诗、书、画、乐各艺兼赅,在创作时能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与这种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对内关系上,唐朝比较宽容,对各种思想文化大体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比如儒、释、道三教,当时抑扬褒贬虽不尽一致,唐武宗时期还曾发生过短期的排佛事件,但总的说来三教一直是并存的。又比如郭震在梓州通泉尉任内任侠使气,亲自参加铸造私钱、掠卖人口的活动,交结联络的同道不下万人,武则天闻名召见,郭震上《古剑篇》自明,中以宝剑被尘埋比喻自己有志而遭埋没,寓意显豁,思想尖锐,态度严正,武则天看后不仅不予处罚,相反还予以赏识和重用。白居易的一些讽谕诗直斥时弊,疾言厉色,尽管使一些“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与元九书》),但这些诗“流闻禁中”,唐宪宗李纯竟能“悦之”(《唐才子传》卷六)。这样一种宽松的环境,使诗人们思想较少拘束,言行比较自由。他们可以在统一的大帝国内,自由游历,既可漫游名山大川,也可走向边塞疆场;既可闲门苦思,也可聚众唱酬;既可写宫禁秘闻,也可写民间疾苦;既可诵清平之音,也可抒愤懑之慨;既可俯首微吟,也可大声疾呼。诗歌作成后,可自由传阅,可交歌妓演唱,元稹、白居易的那些讽谕诗还曾传诵于“牛童、马走之口”,“街卖于市井”之中,写在“观寺、邮候墙壁之上”(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及白居易《与元九书》)。

这种比较民主、开放、自由、宽松的政治和社会风气，为诗歌的创作和流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政治、经济和国势逐渐滑坡，但大体上还维持着一个昔日泱泱大国的气度，经济和文化增长的势头并没有完全停顿下来，有利于诗歌创作的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加之与政治、经济相比，文学艺术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它不会因为政治、经济的衰退而紧跟着立即衰退，因此盛唐之后，中唐乃至晚唐的诗歌创作仍呈发展之势，并曾迭现高潮，屡有新变，将唐诗不断推向千姿百态、圆熟完美的境地。

唐代帝王几乎都喜欢诗，几乎都能写诗。他们实行“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这一方面为庶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步入仕途打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成为唐诗发展繁荣的一个直接而重要的刺激因素。唐承隋制，设置进士、明经等八科选拔人才，而以诗赋取士的进士科最受重视。为了考取进士，士人无不在构思、立意、音律、设辞等诗歌技巧方面下功夫，虽然考试时因受限题、限韵等束缚难以写出好诗来，却为他们写出好诗作了准备，打了基础。由此又派生出了行卷之风，即举子在应考前竭力为自己在社会上制造声誉，请权贵名流为自己延誉推荐，而其所用的办法就是将自己认为最好的诗文卷子送给权贵名流展阅。这对诗人熟练地掌握诗歌技巧，对整个社会重视诗歌、爱好诗歌风气的形成，无疑会起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对诗歌创作的繁荣又产生了十分直接的影响。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